

从“文化展示”到“发展引擎”： 国门文化驱动边疆发展的新范式与协同

吕世林¹ 李虹瑾²

(1.中共红河州委党校,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国门文化”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由云南省于2020年7月1日率先提出的文化建设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耦合粘性,“国门文化”发挥各方游客体验边关文化的新空间通道功能,同时在中外边民交流交往中也扮演着“润滑剂”的重要角色。以西南边疆云南省南部地区红河州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其国门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论证国门文化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和软实力,通过文旅融合、产业升级、民心相通、认同强化等多重路径,有效驱动边疆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对外开放,探讨“国门文化”建设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建设。研究发现,国门文化不仅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文化窗口,更是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战略的核心动能,其成功的“滇南经验”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关键词: 国门文化; 民族地区; 乡村治理; 发展

基金项目:红河州委党校系统课题(项目编号:2025zx-05);红河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5zx-05)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0

在中国广阔的边境线上,绝大部分分布的是乡村,这些乡村在独特的地理基础和历史背景上,与邻国居民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和频繁的交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现象。这些乡村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征,为跨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天然的平台³。在跨国交流的平台,边疆民族展示自己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成为和谐边境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国门文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得以衍生,它不仅是展示国家形象的亮丽“文化窗口”,更是促进中外民心相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固“精神纽带”。

一、“国门文化”建设的逻辑动因

国家战略是国门建设的核心动力之外部推动。云南省,作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沿阵地及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边境,其“国门文化”建设承载了深远的意义,不仅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提出的“三个定位”重要指示,而且成为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一大举措。毫无疑问,国门不只是地理的标记,还是文化的窗口、友谊的纽带、精神的象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848公里,有汉族、彝族、苗族、傣族、壮族、瑶族、回族、布依族、布朗族、拉祜族11个世居民族⁴,这样的民族自治州集“边境线长、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等特点于一身,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和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前沿,是中国陆路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既是“一带一路”展示的窗口,也是有效解决边境移民之间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问题的重要载体,是共建共享的开放平台和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示范区。推动国门文化发展是我国边疆地区一项重要的文化战略,它通过挖掘、展示和传播边境地区的独特文化,不仅增强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还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吕世林(1995—),女,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硕士,统战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虹瑾(1990—),女,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硕士,文化与科技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³ 李智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⁴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https://www.hh.gov.cn/zjhh.htm>,2025,(8)。

边疆民族地区内生发展需求是国门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之内部拉力。乘着国家战略部署的“东风”，“何以”将国门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结合，促进跨境地区文化交流合作，维护和巩固国家边疆文化安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夯实民意，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边疆民族地区对乡村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亟待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从区域主体角度看，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家利益边疆的拓展。从脱贫攻坚结束到乡村振兴，云南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得以大幅改善，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省份而言，边疆通常又是与民族因素相交织的地理区域。因此，在新时空背景下，西南边疆民族大省——云南的社会变迁过程也带动边境地区的纵向横向发展，无疑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各族民众的物质生活质量，并进一步促进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及与周边国家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以红河州为例，历史上即形成了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尤其是跨境民族与境外的同源民族拥有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认同和记忆及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甚至亲属关系。⁵文化活动现今，主要由跨境民族构成的边民已然成为“经济走廊”里传统边贸互市或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主角”，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民众对自己的经济“主体性”角色越来越认同，并不断凸显发挥作用。而由此必然带来他们在乡村“文化走廊”的民族文化交流“主体性”涵化。不可否认，他们既是国家利益边疆的重要拓展者，也是发展成果的主要分享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发边疆各族人民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国门文化”建设驱动边疆发展的分析：基于红河州的实践

一是文化资源驱动与跨境旅游发展。国门文化作为“经济引擎”，直接驱动产业发展。在云南省的“国门文化”建设中，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显现为一种重要策略，通过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经济资本，各州市实现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和文化产品的市场化。红河州河口县依托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的便捷交通，利用其作为国家一类口岸的地位，开发边境旅游线路，利用河口-老街“两国一城”的独特优势，推出“中越跨国旅游”线路，中国游客可便捷地从河口口岸出境游览越南沙巴、河内等地，越南游客也可入境游览红河州元阳梯田、建水古城等景区。共同打造“红河-老街”旅游圈，联合推广旅游资源，实现客源互送、市场共享，带动周边消费增长，成功地将文化活动作为媒介，推广了跨境旅游。两地建立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共商共享共办”，通过一系列文化旅游品牌活动，如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中越边境苗族花山旅游节”等。中越两国苗族同胞会在每年6月聚集在桥头乡老街子村，共同庆祝节日，加强了与越南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以传统花山节为载体，融合民俗、非遗与旅游，设芦笙演奏、爬花杆等沉浸式项目，中越混合组队参赛，双语主持联袂展演，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知名品牌和云南“国门文化”示范工程，实现文旅融合与跨境文化交融双赢。绿春县在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绿春哈尼十月年长街古宴文化旅游节活动时，邀请越南莱州省勐谋县部分党政领导前来参加活动，民族文化和非遗资源，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使其成为边疆地区的新经济增长点，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也为红河州的跨境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节庆艺术薪火相传与文化遗产保护。红河州在“国门文化”建设实践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尤其重视。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措施，比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条例》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不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提升提供了支撑。这些措施的实施，确保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使之成为活生生的文化资本，而不是尘封的历史。进一步地，红河州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传承点，以及扶持各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有效地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化不仅提高了公众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参与度，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特别是通过组织如哈尼长街宴、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节等特色文化节庆活动，这些民族传统节日通过记忆的传承、唤醒和重构，构筑仪式时空、创设仪式情境和进行仪式展演，不仅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⁶。民族成员在共同参与节日仪式这一过程中，个体情感卷入族群情感洪，红河州既活化传统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有效转换。“红河州边民一家亲·携手共奋进”入选“2025 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中越边境苗族花山旅游节”“建水县儒学文化润边境”相继入选（云南）“2025 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⁷云南省建水县文庙以 700 余年历史底蕴为基，推动文旅与公共文化深度融合，每年到这里旅游、研学的人员就达 10 万多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游客，常年络绎不绝，云南游客和边民们在这里了解孔子文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传播儒家文化精髓，“和为贵”“仁者爱人”等儒家理念已经扎下了文化传播的种子，促进边民跨文化交流。联合教育机构开设国学公益学堂，惠及超千名青少年，将儒学文化融入现代教育，

⁵ 阎德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⁶ 解丽霞、郭一：《仪式·记忆·符号：中华传统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载《贵州社会科学》，2025 年第 2 期。

⁷ 红河州 4 个案例入选！“2025 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案例发布，<http://www.wenlvnews.com/p/746602.html>。

融入国门文化建设。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地方文化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也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展示自身文化身份的平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三是促进开放与深化跨境合作。红河州通过“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三位一体,深度促进开放与合作。在“硬联通”上,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夯实合作根基。泛亚铁路东线建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与越南间的货运与客运能力,为大规模经贸往来提供了物理基础:蒙自至河口的高速公路与越南的高速公路网对接,形成了高效的公路物流通道。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持续升级河口、金水河口岸的查验设施、货场、仓储等,提升通关效率和货物吞吐能力。在“软联通”上:在机制创新与平台搭建发力,优化合作环境。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重点发展加工及贸易、大健康服务、跨境旅游、跨境电商等产业。并推出一系列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措施,如“边境贸易结算全程电子化”“跨境劳务合作”等,探索破解跨境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建设保税仓、展示中心,吸引电商企业入驻,打造面向越南及东盟的跨境电商集散地。不仅积极推进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旨在形成“两国一区、封闭管理、境内关外、自由便利”的特殊监管区域,促进产业深度对接与融合。在“心联通”上:通过系列人文交流活动增加民心相通元素,体现了“国门文化”在开放合作中的润滑剂作用。比如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边民大联欢”,以组织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民众开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美食节等互动活动,来促进民间友谊。例如,在2025年春节期间,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联合举办了盛大的跨国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中越建交75周年“中越人文交流年”的亮点活动。每年在河口举办的“中越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不仅是经贸洽谈的平台,更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展演、旅游推介活动,“兴边富民”工程显有成效,真正做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教育医疗合作方面,红河州的高校与越南高校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双方医疗机构也在传染病防控、应急救援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口岸出入境人流量持续增长,商贸、旅游、教育、探亲人员往来频繁,口岸经济活力十足。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吸引了一批加工制造、商贸物流企业落户,促进了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

文旅融合、民族文化遗产与跨境合作不仅提高了红河州文化的外向度,促进文旅产业繁荣,而且实现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换。特别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地理和文化的双重优势,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通过缔结边境友好村寨、定期举办跨国文化节庆活动,强化了与越南等邻边国家的文化联系,也为边境地区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认同感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断加深与邻边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互鉴和理解,有效地促进边境地区文化和谐,构筑了和平稳定的边境文化环境,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边境合作提供了有力示范。

三、红河州“国门文化”建设的困难与疏解

云南省的“国门文化”建设体现了一种多维策略的实施,红河州也不例外。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激发地方的内生动力,并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策略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空间开发、节庆艺术宣传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驱动与跨境旅游发展以及数字平台开发与人文交流合作。红河州的实践展示了云南如何利用其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通过创新和策略性的方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的新发展路径。这些多维策略不仅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新的样本与范式,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展示了文化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与地区发展中的核心价值 and 重要作用。从实践情况来看,红河州在推进“国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在规划和执行层面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影响了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和深度,也制约了“国门文化”建设的整体效果和影响力。

一是整体规划和系统推进机制不健全,跨界合作机制不完善。各县市在实践过程中多有重复和同质化,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活动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难以形成特色和亮点,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从建设的内容来看,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交流平台搭建等方面多呈现碎片化特征,这种碎片化减缓了建设的进度,也降低了建设的效率和质量,成为“国门文化”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的桎梏。此外,与周边国家如越南、老挝等的文化交流合作多间断性和项目化,缺乏长效机制的支撑,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大打折扣。跨界合作的不稳定性体现在合作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上,缺少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例如,为方便中越跨境两族贸易往来,绿春县设有成熟的“口岸”,仅能依赖每月固定开放的“通道”为越南莱州省勐腊县村寨提供购物便利,但这种文化交流更多依赖于临时项目和活动,不规范且缺乏持久的交流平台和制度安排,在交往中容易出现跨文化冲突,增加了合作往来的不确定性。针对上述问题,首要任务是顶层设计发力,加强系统化规划,确立统一的“国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和行动框架,出台相关指导性的跨国文化合作的法律、政策法规,解决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和会议机制。同时,应探索建立跨国文化项目的共同资金池,以保证项目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整合文化、旅游以及外事等相关部门的资源力量,避免资源浪费和工作重复,推动建设内容的创新和多样化,提升“国门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二是文化创新与传播效能协同不足。尽管红河州在与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些努力同时揭示了其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转化上的不足。快速变化的全球文化环境要求传统文化不仅要得到保护和传承,还需通过创新的方式进行重新包装和推广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当前,红河州的文化资产传播和利用主要停留在传统层面,缺乏与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的有效结合,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文化交流上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解决这些问题,亟待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的需求,在“国门文化”建设中,构建一个全面的文化资产管理与创新体系,制定科学的规划和政策,加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分类,对标各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and 传承需求,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保护措施。应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和创新路径。利用数字化技术重现历史文化场景,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人工智能(AI),让更多边民即使在家也能体验民族文化魅力,结合现代传播手段,如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举办在线文化节、虚拟展览等活动,拓宽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和受众范围。此外,加强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通过搭建文化创意孵化平台,支持文化企业和创意工作室的发展,鼓励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人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开发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后,加强对文化创意和数字技术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提供人才支撑。设置针对性的教育课程和工作坊,鼓励年轻一代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创新的热情和想象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中。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与公共文化服务失衡。跨境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设施建设进展缓慢、规划不合理及管理维护不到位。例如,绿春县的边民“通道”加强了与越南的文化交流,但受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整体投入仍显不足,暂未建成标准化“口岸”,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更新进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在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存在统筹兼顾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绿春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以及群众思想观念相比河口、金平两个“口岸”县仍然有差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在区域间和群体间发展不均衡。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优先将“国门文化”项目列入重点发展计划,增加专项资金支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统筹用好省级财政资金,整合文化惠民项目资金,确定中央和省级对新建、改造、提升文化口岸交流中心,建设“国门文化”友谊广场、建设“文化睦邻示范区”等项目的补助标准。新建和改造一批图书馆、文化馆、国门书社、文化服务中心等。其次,采取多维度综合策略,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鼓励和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国门文化”建设及相关领域,通过独资、合资、参股、联营、合作及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产业项目开发、文化产品生产经营和文体赛事运营,提高建设效率,增强私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家给予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促进文化均衡发展。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均衡问题,需要强化服务内容的设计与规划,特别是扩大对民族边境地区及其他特殊人群的文化服务覆盖范围,开发针对性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活动。利用数字化手段拓展服务范围 and 深度,如建立在线文化平台,提供虚拟展览、在线演出等服务,突破文化服务的地域限制;同时,推动地方政府之间的文化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通过建立跨区域文化合作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and 有效用,缩小各地区之间文化服务供给差异。政府部门加强横向联系,协调推进区域间的文化项目合作,共同开发文化活动,分享文化资源,依托边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沿边跨国的文化资源市场,积极支持培育文化企业、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旅游融合景区等,发展边境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再次,重点培育特色文化街区和集市,融入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助力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文化贸易和交流合作,盘活和挖掘边境地区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培育文旅新产品、新品牌和新业态,促进边境州市、县市的协同发展。最后,建立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强化文化建策略与措施监管和评估机制,确保文化建设有效性,促进区域内的文化互鉴与和谐共生。

结语

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语境下,云南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既是边疆“战略前沿”,又是具有门户功能的辐射“端口”。“国门文化”通过保护和传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挖掘和整合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利用,开发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生活,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和创收途径。积累地方的文化资本不仅激发了乡村地区的内生动力,还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衍生的文化产业发展也激发了边民内生发展动力和创业热情,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真正践行了“兴边富民”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焕发出边境地区文化的生机与魅力,促进了国内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与深入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力量。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看,“国门文化”建设的实践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文化交流平台的建立、文化教育项目的开展,有效提升了边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也促进了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介入现代化文化管理理念和技术不仅提高了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增强了公众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通过“国门文化”

建设促进了文化立法和政策创新,建立了一套更为完善的文化保护和发展机制,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展望未来,“国门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战略应聚焦于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国际文化合作,加大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要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宽度,探索更多元化的交流形式和合作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构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交流体系,为全球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为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EB/OL]. https://www.yn.gov.cn/ztgg/jdbyyzsjzydfxfyqj/2025jw/chjmwxx/xxbj/202503/t20250326_310633.html.
- [2] 红河概况[EB/OL].<https://www.hh.gov.cn/zjhh.htm>.
- [3] 李智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大学学报, 2014(2).
- [4] 阎德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2).
- [5] 解丽霞,郭一.仪式·记忆·符号:中华传统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5 年(2):76-83.
- [6] 李文军,陈妹.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其创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23(03):23-30.
- [7] 龙玉其,和润铃.兴盛、冲击与调适: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基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市 S 乡 B 村的调查[J].青海民族研究,2022,33(02):42-52.
- [8] 红河州 4 个案例入选!“2025 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案例发布[EB/OL],<http://www.wenlvnews.com/p/746602.html>.

"Cultural Exhibition" to "Development Engine": A New Paradigm and Synergy of Borderl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National Gate Culture

Lv Shilin¹ Li Hongjin¹

¹HongHe Prefectu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ngzi, Yunnan 661199,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e" i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cept first proposed by Yunnan Province on July 1, 2020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roposal of this concept is coupled and sticky to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Gate Culture" plays the role of a new spatial channel for touri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experience border culture, and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lubricant" in exchang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border people. Taking Honghe Prefectur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s a typical case, by analyzing its practical model of national g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we demonstrate how national gate culture is a speci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oft power. Through multiple paths such a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trengthening, it effectively drive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stability and opening up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ed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gate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areas. The study found that na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a cultural window to show the national image, but also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border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stabilizing the border and consolidating the border". Its successful "South Yunnan Experience"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for other border ethnic areas.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e; ethnic areas; rur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